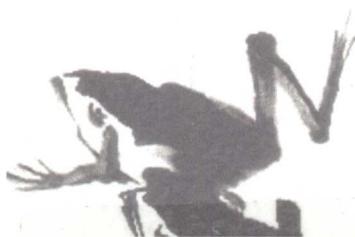


鲁迅的写作与 民俗文化

王元忠 著



鲁迅的写作与 民俗文化

王元忠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的写作与民俗文化 / 王元忠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004-8860-6

I . ①鲁 … II . ①王 … III . ①鲁迅著作—关系—风俗—习惯—中国 IV . ①I210. 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9457 号

责任编辑 刘志兵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249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代序） 鲁迅的写作和民俗文化关系研究的	
话题形成	(1)
一 研究者的认知误局对于话题的遮蔽	(2)
二 鲁迅写作的实际表现及其话题建构的可能性	(9)
三 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和问题形成的原因分析	(16)
第一章 鲁迅写作的民俗兴趣发生	(22)
一 个人经验的本原性诱发	(23)
二 时代风气的外在推动	(26)
三 写作目的的内在规范	(28)
第二章 鲁迅人生的民俗文化视野观照	(34)
一 生命初始时的民俗待遇	(36)
二 成长过程中的民俗事项：祭祀和看戏	(46)
三 婚俗的顺从和背叛	(53)
四 疾病与中医	(71)
五 死亡事件的民俗参与	(83)

第三章 鲁迅的民俗观	(97)
一 鲁迅民俗认知的相关背景	(98)
二 鲁迅民俗思考的具体内容	(103)
三 鲁迅民俗观的建构特点和价值	(118)
第四章 民俗文化对于鲁迅写作理论的影响	(124)
一 民俗文化与鲁迅写作理论的关系发生	(124)
二 民俗文化对于鲁迅写作理论的具体影响	(128)
三 鲁迅民俗思考的启示意义	(161)
第五章 民俗文化在鲁迅写作中的存在形态及表现	
特征	(168)
一 民俗文化在鲁迅写作中的存在形态	(168)
二 民俗文化在鲁迅写作中的表现特征	(180)
第六章 鲁迅写作对于民俗文化的主体措置	(196)
一 意义的措置	(201)
二 结构的措置	(211)
三 文体的措置	(230)
第七章 鲁迅民俗文化表现的写作意义	(246)
一 鲁迅写作所体现出的两种民俗文化认知视域	(247)
二 鲁迅民俗文化表现的写作意义	(254)

第八章 鲁迅的民俗文化表现对于后来中国作家的 影响	(288)
一 后来作家对于鲁迅民俗文化表现的历史继承	(290)
二 后来作家的变异和鲁迅写作的资源再生意义	(298)
主要参考文献	(303)
后记	(312)

导论（代序）

鲁迅的写作和民俗文化关系 研究的话题形成

从文化视角言说鲁迅写作的人，注意力一般较多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化影响两个面向，前者着重于批判，而后者则侧重于吸收。此外的关注自然还有，例如民间文化对于鲁迅写作的影响。因缘于 20 世纪中国政治形势的特殊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形成了一定势力及至取得政权之后，对于劳动者“固有文化”的提倡和重视，所以从文学的阶级性分析或民间艺术对于民族作家创作的影响等方面，对鲁迅写作与民间文化的关系，许多研究在一定层面上也进行了一些揭示和说明。但总体看来，由于既有的政治意识形态从本质上对于研究者思维的限制和规范，加之一些研究者根深蒂固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作祟，因此，关于这一话题的思考，无论在话题展开的广度还是研究者认识实际所达到的深度上，学界的作为较之人们在前两方面所做的努力，都显现出了难以掩饰的不足。

这种不足突出地体现于鲁迅的写作与民俗文化关系的考察。一方面，从鲁迅写作的实际看，民俗以及与民俗相关的文

化材料，构成了鲁迅写作极为丰富并且极有意味的写作内容；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民俗文化在鲁迅的写作中，更多的是以精神形态或隐性方式而存在，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人们生存的文化氛围和思想意识，加之许多研究者主观上对于民俗文化本身存在着的理论认识上的不足，所以，在鲁迅写作与民俗文化关系话题的研究上，虽然一俟鲁迅作品发表，就不时有人提及，但除却个别研究在一些零散点上偶见新论之外，此前的研究则大多表现得简约、表面且零散。

已有的研究如此这般的表现，招致了人们对于鲁迅的写作和民俗文化关系话题建立的必要性的怀疑。民俗文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鲁迅的写作？它到底能不能构成我们理解或考察鲁迅写作的一个有效视角或必要的学术话题？如此这般的质疑是常见于我们日常的交流的。

为人们的怀疑所吸引，加之不满于已有研究在鲁迅的写作与民俗文化关系话题上的表现，所以本书在文本细读和问题语境历史还原的基础上，希冀能够通过具体的分析，对人们于此话题的质疑做一些个人力所能及，但也较为系统的说明和回答。

一 研究者的认知误局对于话题的遮蔽

人们为什么会对这一话题的确立产生质疑呢？在对话题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前，我觉得这应该是人们考察鲁迅的写作和民俗文化的关系时应该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从多种角度给予回答，但从研究者自身的情况看，我个人以为除却对于鲁迅作品阅读的不仔细不认真之

外，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许多欲从文化视角考察鲁迅写作的研究者，其作为立论依据和思维运作“支援意识”^① 的民俗文化知识和理论积累相对比较匮乏。

人类对于民俗文化的认知兴趣理所当然伴随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就已经开始，但正如中国民俗文化学科创始人钟敬文先生所言：“把民俗作为一种科学的对象来研究，只是现代的事”，“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俗学则更是迟至‘五四’前后从国外传入的”^②。

现代民俗学科存在历史的短暂（它真正的创建是 19 世纪中叶才开始的），以及由此自然形成的有效积淀的不足，加之中国文化界对它的接触时间更短，也更仓促，所以，外在的条件客观上使得中国民俗学未能在既有的历史中创造其足以让人侧目而视的成就，并因此给一般中国知识分子提供多面深层的观念和方法启示。连环反应或者恶性循环，学术活动在理论准备上的这种不足具化于鲁迅写作的研究，一般研究者对于民俗文化表现内容及意义关注的不够，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接受和准备的不足之外，学界对鲁迅的写作和民俗文化的关系之所以不够关注，我以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 20 世纪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环境所影响，有意无意之中，很多研究者在思维观念上对于鲁迅和民俗文化心存了一些认识上的问题。

^① 博兰霓（Michael Polanyi）语，见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50 页，其意为：在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思想中所表现出的在潜移默化中所受教育的影响。

^② 钟敬文：《序言》，见高丙中《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 页。

问题有种种表现，但撮其常俗，则无外乎如下几种类型：其一，民俗乃低俗、原始的文化表现物，鲁迅则本质上是用心于新文化建设的中国新知识分子的代表，所以，对于作为古旧遗留物的民俗文化，鲁迅在写作层面的关注自然也不会太多。其二，民俗文化乃中国传统的一种构成，由于长期以来中国民众整体上的不觉悟，因此其已然成为腐朽反动的传统文化的别一存在。鲁迅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思想启蒙者，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思想以激烈的反传统为其使命，所以在写作实践层面，民俗文化自然难以从正面或者积极的意义上对鲁迅的写作发生现实的影响。其三，民俗文化乃民众日常生活文化的或一构成，它在形成过程中虽然不断为人所提炼、改造，也经历了或经历着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粗糙到精致的稳定化过程，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毕竟只是一种粗糙简陋的文化。鲁迅作为一位具有极为深厚学识修养的现代写作者，其写作本质上是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而发生的中国现代精英文化的一种构成，所以以本土、民间、传统为其立足点的民俗文化，其与鲁迅写作的关系，想来也实在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研究价值。

泛泛而言，这些认识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仔细斟酌，若是按李欧梵先生所言，在考察一种认识形成时“重溯谱系”，并将这种认识“放在它得以产生的文化环境来看”^①，则会发现这些认识产生的背后，其实是有许多基本认知前提上的错误的。

首先，它们大多有意无意的体现出了英国早期人类学派理

^① 李欧梵：《总序（一）》，见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解民俗文化时的一些缺陷。英国早期人类学家对于民俗的思考，始自威廉·汤姆斯。汤姆斯以“民众的知识”指称民俗，其概念原本是很有伸缩的弹性的，但由于在知识的姻亲关系上，他的“民众的知识”本就脱胎于在英国时髦了上百年的“古董”和“大众古俗”^①之概念，加之其所提出的另一概念“遗留物”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明确内涵，所以民俗作为“古代文化遗留物”的观念，经英国民俗学泰斗泰勒而至英国民俗学会编写的《民俗手册》（1890 年出版），遂基本成了人们普遍认同的观念。毋庸讳言，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提出，直接推动了民族主义复兴背景上的欧洲大陆各国家民族传统文化——如民族学、人类学等研究的发展，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世界范围内的民俗文化研究发挥了理论指导功用，但是，由于对民俗于普通人实际生活之中复杂丰富的表现形态考察的不足，所以英国早期人类学派对于民俗文化的认识，也表现出了如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教授所指呈的那些问题：“有些民俗学家的确认为，民俗是由遗留物构成的（Maranda, 1963）。在某种情况下，据说是不再存活的一种遗留物，也就是说，民俗是僵死的。”^②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俗理论的了解，大多与英国早期人类学派有着某种知识谱系上的姻亲关联。20 世纪初“北京大学歌谣征集活动”的展开和福建、广州等地进行的民俗运动本就有搜求散佚、保护遗存的动机；早期民俗学者如刘半农、周作人、顾颉刚、林惠祥等的学术活动，无论翻译还是研究，

^① 高丙中：《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7 页。

^② 阿兰·邓迪斯：《民俗解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34 页。

其所依据的理论，也基本上都来自英国人类学派。这种情况贯穿或者说影响了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即使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民俗学科的发展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在谈到自己所进行的民俗文化研究工作之时，钟敬文先生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慨叹一般中国人对于民俗文化理解的滞后：“比如有人问：你研究的东西都要消失了，你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① 这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事例，但将我们周围一般人对于民俗所持存的理解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考察时，我们则不能不发现，英国早期人类学派对于现代中国民俗文化思考和认知所产生影响的巨大。

这种影响自然不尽是负面的结果，但其不足则在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此在骨子里对于民俗文化于人们当下生活意义的轻视，以为民俗文化只是发生于过去而现在已失去其意义的一种存在。因为持存者如此这般的观念，所以在思考鲁迅和民族文化关系时，一般研究者不重视其写作与民俗文化关系的研究，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其次，这些偏见也凸显了一般鲁迅研究者在措置鲁迅与传统文化、民俗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构建关系时的某种简单武断的态度。考察鲁迅本体精神世界的构成，我们固然可以看到，因为强烈的民族复兴和国民精神改造动机，所以鲁迅和同时代许多激进知识分子一样，终其一生都坚持了一种激烈的反传统立场。但是，联系实际具体分析，我们自会清楚，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在另一方面，若不拘于定见，以更为辩证的态度重新审视鲁迅和许多现代知识分子的言行，我们亦会发现，

^① 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9 页。

在反传统之外，他们也和传统保持了远较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复杂关系。所以真实的情况，也许正如《鲁迅评传》一书的作者吴俊所言：“正当我们把鲁迅视为‘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化身，并为他对于封建的传统文化所作的激烈批判和否定而感到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的时候，鲁迅生平和精神景观的另一面也同样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考鲁迅一生，谁又能否认，鲁迅实在是一个在传统文化中浸染甚深的人。在这一点上，鲁迅和他的同时代知识分子没有任何丝毫的区别。不论在他早年接受教育的生涯中，还是在他成年以后乃至毕生所从事的事业和工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鲁迅其实是根本无法兑现他的‘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的诺言的，他也根本无法真正斩断自己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如果我们可以此说鲁迅是中国‘五四’新文化的思想代表，那么我想我们也同样能够说，在鲁迅身上也有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神素质的深刻渊源。”^①

这样的思考鲁迅自己生前其实就有，在《影的告别》等许多文章中，他反复强调了自己一代人所具有的“历史中间物意识”——“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②以这种复杂的心态解读鲁迅与民俗文化的关系，我们便会明白，即使将民俗文化完全目之为传统文化的一种构成，但属意于民族文化传统和国民精神改造关系的鲁迅的写作，其对于体现国民精神心理的民俗文化及活生生的生活现实表现，自然也不会等闲视之。

① 吴俊：《鲁迅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② 鲁迅：《影的告别》，见《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除此而外，还有一些人，他们执意于鲁迅等人的反传统一面，极为强调他们作为精英文化代表的角色意义，因此在考察鲁迅写作与文化的关系时，将自己的注意力更多也更自觉地集中于知识分子文化面向，而于民间文化与鲁迅写作的关系，则自觉不自觉地予以忽视或排斥。孤立地看，他们的认知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在合理之外，若对问题做全面考察，其片面性和偏执性同样昭然可见。

细观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作为，西方启蒙主义思潮之后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哲学思考，固然是他们重建现代民族国家和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参照，但与此同时，因为鲜明的民族复兴动机，中国知识分子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所进行的思想启蒙也罢，现代化追求也罢，其观念意识之后，其实还是有着一种非常实际的与“民”进行对话交流的动机的。只有民的觉醒，才是革命能够成功的关键，这是近现代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许多流血和挫折之后才逐渐明白了的一个道理。缘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所发动的一场又一场的改革或革命运动，便大都有了某种“向下看”的意味——如语言的通俗化、妇女解放运动、写实主义、无产阶级文学，等等。在现代中国的文化思潮并及文学的种种表现之中，虽然这种民间或民众本位的“向下看”取向，先后经历了从个人自觉而到政党要求的转化，但是转化并不能改变民间取向本身深入也贯穿整个20世纪中国人生活的历史事实。立足于这样的思维路向，民俗文化作为民众精神和民族特性得以显现的现实文化载体，它与意图通过写作而揭示“国民沉默之灵魂”而重建民族精神文化的鲁迅的写作之间的关系发生，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 鲁迅写作的实际表现及其 话题建构的可能性

不过，上述论述还只是一种合理的推测，而将这种推测落实于鲁迅具体的写作之时，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对民间文化的稔熟，不断的生活变故所导致的对于旧式家庭和传统文化的失望，加之“五四”启蒙思潮整体上的“向下看”思路，因此鲁迅的写作——不仅文学性极强的小说和散文的写作，而且就是一般人看来非文学的杂文、学术研究等类文章的写作，其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其实也是有着丰富而多样的内容和层次的。

为了说明情况，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鲁迅的小说《祝福》描写苦女人祥林嫂的死亡之旅时，先后运用了三种民俗活动材料：再嫁（不幸的开始），捐门槛（自我的赎罪努力）和除夕的祭祖（努力的无果：死亡并及人世的漠然态度）。其中描写祭祖活动时提到了一种被称作“福礼”的民俗用物——也就是古书中常说的“牺牲”：“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① 这“福礼”或“牺牲”，作为节日礼俗的一种构成物，在《祝福》中，它为小说人物的活动营造了某种适宜的文化环境和情节氛围。但是鲁迅的思考显然却并未停留

^① 鲁迅：《祝福》，见《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于这一层的功用，在有意识地将祥林嫂的不幸遭遇和周围众人的麻木反应进行对比之时，他想告诉人们的，实际上就是众人之所以一遍又一遍地希望祥林嫂讲述她的不幸，他们的动机其实不是因为对于她的同情，而是想从她的不幸中，获取某种享受“牺牲”样的快乐，所以，在别一意义上，祥林嫂也可以说是冷酷人间的一种牺牲。

和其他许多作品的表现一样，对于具体民俗事象的运用，鲁迅似乎很少就物写物，就事论事，他更为常见的做法就是在人物主体与具体民俗对象现实关系的生动展开之中，亦即人物对具体民俗的实践之中，显示个人对于以集体和历史为名目出现的社会规范的不可抗拒或无可奈何。这样的表现事实上反映出了一种极为现代的民俗文化思考——在本质的意义上，民俗不仅是一种静态的过去了的历史文化，而且更是一种活生生的当下的民众生活。谈到民俗文化的存在并及研究时，钟敬文先生曾说：“民俗文化是一种传承文化，但它如果不能与民众的现实生活保持血肉联系，它就早被民众淘汰了”，所以，如果“民俗文化的研究离开了现代性，同样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①。高丙中先生也以为：“民俗有两种存在形态：文化的和生活的。如果民俗作为文化而存在，那么，它表现为符号，表现为累积的知识和文明的成果，它是相对静止的，它是人的活动所完成的”，而“如果民俗作为生活而存在，那么，它表现为活动，表现为知识的运用和文明的事件，它是动态的，它是人正在进行的”^②。他们的话为我们理解鲁迅写作的民俗文化

^①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见《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0页。

^② 高丙中：《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表现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论据。

因为这样的认知思考，所以鲁迅对于民俗文化的表现，便正如他写作中面貌繁多的“牺牲”一样，显现出了复杂多样的思想和艺术内涵。它们是一种题材，但更是一种核心隐语和精神主题，其表现遍布于鲁迅长短不一的各种文本，其中小说如《药》、《明天》、《孤独者》、《示众》，甚至《长明灯》、《孔乙己》等；散文如《野草》之《题辞》、《复仇》、《复仇》（二）、《颓败线的颤动》等；诗歌如《自题小像》之“我以我血荐轩辕”，《无题》之“血沃中原肥劲草”及《庚子送灶即事》、《悼杨铨》等；杂文更多，如《热风·随感录四十》、《暴君的臣民》、《牺牲谋》、《纪念刘和珍君》，等等。

若对民俗文化的认识不止于某种历史化、文献化的实物指正，而换种观念，一如美国学者萨姆纳一样“把民俗置于生活范畴”，“把‘生活世界’看作民俗学的领域”^①，且将考察的重点集中于人与自己所置身的文化生活环境和个人与他人、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我们自然便会知道，可作为研究对象的鲁迅写作中的民俗文化表现原本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矿藏的。

而且对象存在的数量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深入到具体的文本，在鲁迅对于民俗文化的理解和表现之中，我们亦可以发现鲁迅的思考，无论对中国现代文化还是现代文学的建设，其实是有着多方面的启示和价值的。

在鲁迅的写作中，人们可以看到，他对于民俗的兴趣，显然并非一般文人写作猎奇或一己雅兴表现之可比拟。鲁迅是一

^① 高丙中：《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 页。